



基础教育
质的研究丛书

金一鸣
主编

民族中学 现状剖视

陆启光\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基础教育
质的研究丛书

金一鸣 主编

民族中学 现状剖视

陆启光 \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中学现状剖视/陆启光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金一鸣主编)

ISBN 7-5328-5473-6

I. 民... II. 陆... III. 民族学校: 中学—研究—中国 IV. G6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6508 号

金一鸣 主编

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

民族中学现状剖视

陆启光 著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规 格: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15.25 印张

字 数: 231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5473-6

定 价: 33.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这套丛书定名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丛书的名称是在与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温玉川编审和王慧编辑反复斟酌之后才定下来的。名称之所以难以确定,是因为这套丛书有其特殊性。我建议出版这套丛书的原意,是想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用质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成果汇集出版,借以提倡质的研究方法。编入丛书的各册的共性是其研究方法,所以,无法援引编丛书的惯例以一个专题的名称作为丛书的名称,也不能以质的研究方法来冠名,因为丛书并不全面论述质的研究方法本身。最后,还是温主任出了一个好主意,称之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其好处是概括了丛书中几本书的共性: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作的质的研究;研究领域方面也有一致性,所研究的都是属于基础教育范围的教育问题。

编入丛书的几本书是几位青年学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的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篇博士论文是有其学术规范的,在论文的开始要论述课题的意义、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自己期望的创新之处、选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工作的进程等。这次出版时,这些部分或省略了,或压缩了,或移动了位置。这是因读者对象的不同而作的变化。第二,在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和论文评阅人都对论文提了不少意见。作者们都认真听取了意见,并研究了这些意见,这次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修改得好一些。第三,质的研究的成果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性的。有的论文写得比较早,论文中所反映的是当时学校、班级、教师和学生情况,现在情况在变化,需要重新调查、补充新的材料,以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第四,有的以原有论文的一个部分为基础,加以扩展。总之,这几本书都是原有论文的补充和延续。

丛书既以质的研究冠名,在出版之际还需要对教育研究方法及质的研究方法作点说明。

研究方法对每门科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发展、繁荣和创新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教育科学以教育现象为研究对

象,其目标是探明教育规律,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都是服从与服务于这一目标的。

研究教育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查文献,开调查会,发问卷,听课,与教师和学生访谈等等。如果把研究工作加以分类,则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或范式。“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的、经验的、可量化的观察。另一种范式是从人文学科推衍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的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①这两种范式可以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的称之为理性主义探究范式和自然主义探究范式,有的称为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人们都认识到,这两种范式是有差异的,孰优孰劣时有争议。

其实,这两种范式都是在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育研究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教育的历史非常悠久,自从有了人类就有教育;有了教育自然也就有了对教育的研究。最初的教育研究是教育者对自身教育经验的总结。在实践中,他们探索着应当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这种经验总结是零散的,可以见之于留传下来的各种典籍之中。这些经验的结晶不乏真知灼见,现在读来还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与教育的历史相比,教育学的历史是太短了。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独立出来是近代的事。当时,教育正在走向普及,教育制度正在形成,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事业,许多教育问题需要系统的回答。于是,一些先进人物试图“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探求“改良学校”的方案。这才有了系统性的教育学著作。后来,赫尔巴特和杜威等人则以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参照他们个人的教育经历,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经验,写成专著,系统地回答了学校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如教育目的、课程与教学、学校的德育以及学校的管理等。他们的著作成了教育理论的经典之作。

教育在进步,教育科学要发展,人们也就日益关注教育研究的方法问题。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正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时期。自然

^① [瑞典] 胡森著,唐晓杰译:《教育研究的范式》,瞿葆奎主编:《教育研究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9 页。

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相信:世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只要诉之于理性就可以发现规律,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的正确性是可以实验的方法来加以验证的。科学实验成了科学研究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受此思潮的影响,教育理论界也就日益推崇教育实验,认为只有通过实验教育科学才能提高其科学性,使之达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精密的程度。用教育实验来研究教育问题成了一时的风尚。例如,新编了一本教科书 A,就要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教科书 A 优于原有的教科书 B。实验要选两个班级,一个是试验班,一个是对照班。这两个班的基本条件完全一样(如班级人数、学生水平、教学设施以及施教的教师及其使用的教学方法),唯一的差别只是试验班只用教科书 A,而对照班用教科书 B。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再测试学生的学习成绩。如果试验班的成绩与对照班的成绩有显著差异,才能确认教科书 A 优于教科书 B,才能做出推广教科书 A 的决定。

教育实验仿照的是自然科学的如物理、化学等的实验。实验前要有明确的假设(教科书 A 优于教科书 B),实验过程中要有严格的控制,排除各种非实验因素的干扰(两个班级的条件一样),实验的结果是用数量来显示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学业成绩的比较)。教育实验的推行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使研究人员用理性的方法思考教育问题,也带动了教育统计与测量等学科的发展。教育实验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在推行教育实验的过程中,人们也感到教育现象是难于用实验的方法去进行研究的。首先是许多问题的解决很难在事先提出明确的假设。第二,实验的条件难以控制。所以,有的学生将教育实验按其控制的严密程度分为实验、准实验和自然实验。自然实验实际上已经很少控制了。第三,要测定教育成果、学生的变化相当困难。一是没有适当的测量工具,二是量的变化未必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未必能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评价教育时必然要涉及教育的价值观。这些是教育实验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教育实验盛行之时,教育理论界就有不和谐的声音,有的学者并不赞成教育实验。他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不能袭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界常用的研究是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一些学者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但,长期以来,教育实验一直

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主流。记得我国在 20 世纪的 80 年代还曾提出过“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这样的口号。

质的研究的兴起与教育社会学有关。教育社会学是介于教育学与 sociology 之间的边缘性的交叉学科,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教育问题。20 世纪初,就有学者用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学校教育问题。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社会学的兴起促进了现场研究的方法,带动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质的研究尚处于教育研究的“边缘状况”。质的研究的突现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期。当时,社会处于一种变动的状况,教育领域里发生了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如城市学校里的教育状况很不理想,许多学生“达不到学校要求”等。要探究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靠量化的研究方法、搞教育实验,显然是得不出结论的。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拨出专款,资助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结合起来,共同到学校里去作质的研究,观察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研究改进学校教育的方案。此后,质的研究方法才为较多的人们所接受,质的研究逐步发展成与量化研究相抗衡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

质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有学者介绍这种方法,有一些研究生常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的是:

第一,强调整体性。主张质的研究的人都认为教育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具体性的。一个国家的教育是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联系着的;一个学校是一个整体,它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学校内部又是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班级也是一个整体,教师和学生也是紧密关联的。如果不从整体上了解教育,只关注教育的一个因素、一个方面、一个现象,就可能导致“失真”。因此,教育研究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所要研究的对象和问题。

第二,注重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或者实地研究,是质的研究的基本方法。它要求研究人员用相当长的时间到所要研究的学校、地区作实地的调查,要亲身体验所处的环境、真切地感受所要研究的问题。为了全面地了解情况,要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关于现状的各种记录要同各方面的人员作深入的交谈。总之,研究人员要深入了解问题的历史、现状,切实地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而不允许只凭听取的汇报和介绍。

第三,要正确处理研究人员和被研究单位人员的关系。在质的研

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研究人员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当然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学术观点,但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被研究的单位、人员,而是要虚怀若谷地、耐心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各种不同的声音,特别要从研究者的角度、身份去体会他们实际遇到的问题、困难以及成功的喜悦。研究的过程,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交流、讨论的过程。研究人员甚至可以由“旁观者”变成“直观参与者”,共同来解决问题。质的研究的成果是互动之后形成的共同的结论。

第四,用生动的叙述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质的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不同于教育实验的实验报告。它着重于用各种事实材料(如档案、文件、访谈记录、实际的观察、照片、录像等)展示实际的情况,叙述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以,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深描”,是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常人所共见的一些现象突现出来,引发人们的思考。

第五,研究人员所追求的目标不像量化研究的研究者那样要告诉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研究人员是想通过自己的描述帮助读者增进对教育现象的理解,从而使读者能从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于两种研究范式时有争议。在我看来,教育现象是复杂的,需要从多方面去探索、思考,教育研究方法是可以多元的。两种研究范式各有其利和弊,各有其适用的方法。教育现象中有的可以量化的,可以用量的研究方法,也应用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已有了明确的设想,能够做出严密的控制,可以用教育实验的方法来证明研究者的设想是否正确。但是,不可否认在教育领域里确有不少方面是难以量化的。涉及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如教育的价值观、教育目的、学校文化等,就难以量化。涉及教育领域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教育管理者的关系、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等,也是难以量化。用量的研究范式去研究难以量化的问题,必然会曲解现实,凡属这一类的问题就应用质的范式去研究。

收入丛书的几本书所涉及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民族中学的特殊性,都是适合用质的研究范式去研究的。所以,我鼓励他们按质的范式去研究,也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出来,也希望读者能从他们的成果中得到一些启迪。

其实,我提倡质的研究范式还有另一种考虑。现在,国内的一些青年学者很喜欢作一种思辨式的研究,如根据某一种哲学思潮或社会思潮去推导出某些教育结论,又如根据某一种国外的教育理论或经验推导出我国教育改革应当如何进行。这些思辨可以启发思考,但它同教育实际是隔膜的,其结论的正确性也是有待检验的,未经证实的。我深感,教育科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贴近实际的教育生活,只有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教育科学才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到教育实际中去,作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是他(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学会调查是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我鼓励他们作质的研究也是希望他们能在实际中夯实学术基础、学会基本功。这是我对青年学者的期望。

金一鸣

于华东师范大学

2006年5月

前 言

2001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做博士论文,题目是《壮族儿童社会化研究——广西乐业县实地调查》。壮族儿童的社会化与壮族儿童所接受的教育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文中也涉及民族中学,但当时主要是从民族中学教育对壮族儿童影响的视角去考察壮族儿童的社会化问题,对于民族中学如何发展问题思考不多,只是感觉到其中有许多问题急需去梳理和解决。

“壮族儿童社会化”问题是一个原发性很强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可生发出壮族儿童的学前阶段教育、小学阶段教育、初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大学阶段教育乃至壮族地区学习化社会如何构建等等问题进行研究。

民族教育在我国的研究是“冷门”,关于民族中学的发展问题还没有人作专题的思考。县一级的民族中学主要承担的任务是完成民族学生初中阶段的教育。当然,民族地区同级的普通中学也承担这一任务。初中阶段教育是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县级民族中学要完成的是民族地区初中阶段学生的教育普及的任务。

民族中学不但要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她又面对一些实实在在的新问题,如:民族中学的特殊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民族性如何保留?如何解决民族语言与越来越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民族中学发展十多年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政府、社会、学校在民族中学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如何创设一个有利于民族中学发展的大环境?在既有条件下,民族中学自身应该做哪些工作?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希望在乐业县民族中学的历史发展进行追寻和探讨时能够做出或多或少的回答。

对于同一问题可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和探讨,这根据问题的性质及所要达到的目的来选择。对民族中学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对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和探讨,这不是仅仅坐在书斋里就能想出来的,必须深入到具体的环境中去进行调查,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否则只能得出想当然的“结论”,更难以提出符合实际需要的解决办法来。

质的研究强调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现场观察,深入细致地分析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现象,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力求找到问题的根源,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正是对民族中学发展问题进行探讨所需要的。

当然,质的研究也对研究者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特别是研究者的文化经历,尤其是对民族教育这一类问题进行研究时更是如此,因为没有相应的文化经历就难以甚至是无法理解种种民族文化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民族心理。“解释学对于理解的前判断结构的认识主要在于,我们比他者能更好地理解自身。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①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乐业县壮族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或许有更多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乐业县中学读初中。乐业县是一个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县,我幼小时就知道壮族人比较有地位,壮族人一般不会娶汉族人做妻子,而汉族人则以能够娶到壮族妻子为荣。童年时不知道有什么壮文和壮文学校,初三(1983—1984年)时,表哥到乐业县壮文学校学习,终于知道了壮校是学习壮文的学校,当时有很多人去学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4—1987年)到广西民族学院高中部读高中(原来称广西民族学院预科部高中班),知道了民族高中的学生与普通高中学生的主要区别是民族高中的学生可以享受到民族补助,并且民族高中可以读四年才参加高考,但课程上是一样的。读高中这阶段正是乐业县民族中学的筹建阶段,有一个初中同学家在民族中学,我们去玩时,学校正在施工。大学毕业后回到乐业县教师进修学校(原来的乐业壮校),知道民族中学办得比较差,后来还在民族中学住了几年。做博士论文时对民族中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考察,深切感受到民族中学的点滴变化,在决定对民族中学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后又回到乐业县民族中学进行了长时间的专题调查。因此,对于乐业县民族中学,我的感性认识不能不说是丰富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进行研究如果只具有丰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现代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富的感性认识仍然是不够的,从根本上来看他更需要对这些感性认识进行理性的思考。“理解者把他的主体性贯彻在认识过程当中,目的是要满怀热情地从他者身上重新发现自我。”^①在探寻民族中学发展的过程中,对我而言,还需要从固有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情感中超脱出来,这样才能客观地对待所要研究的问题,防止形成狭隘的民族偏见。

民族中学首先是中学,她具有普通中学共同的使命。又由于民族中学是“民族”的,学生主要来自少数民族,他们从小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这是民族中学安身立命的基础,因而民族中学就具有了自身的特殊性,她必须为民族发展服务,具有民族特色。从这两个着眼点出发,我们将民族中学定位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普通中学。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去思考民族中学的发展问题的。当然,乐业县民族中学仅仅是我国众多民族中学中的一个个案,我们希望从这个个案出发,抛砖引玉,由此能引发更多人去思考民族中学和民族教育的发展问题,写出更好的著作来。

最后,还要对本书的框架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本书主体共分五章,外加前言及后记。前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以及全书的结构。第一章对乐业县民族中学的概况进行分析,得到的初步结论是该校是一所条件比较差的、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初级中学。第二章主要阐述乐业县壮族至今仍然保存的传统民族文化,这是乐业县民族中学成立的民族基础。第三章主要是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教育政策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然后主要分析我国民族中学及乐业县民族中学的发展历史,一方面说明了民族中学的建立是国家统一与稳定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也探讨了我国民族中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第四章主要是对乐业县民族中学的课程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第五章主要是对民族中学历任校长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陆启光

2006年5月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现代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Contents

目

录



序	金一鸣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民族中学印象		001
◆一 民族中学与普通中学的共性		001
◆二 民族中学的个性		010
第二章 熏陶壮族儿童成长的民族文化		038
◆一 婚姻文化		038
◆二 语言文化		058
◆三 生活文化		067
第三章 民族政策的保障作用		088
◆一 民族政策与民族中学		088
◆二 双语政策与民族中学		114
◆三 乐业县壮文学校		123
◆四 乐业民中十六载		138
第四章 课程问题		149
◆一 普通课程		149
◆二 民中的双语教学		177
◆三 非双语教育中的民族教育		188
第五章 校长的素质		198
◆一 将壮文教学视为工作中心的民族中学校长		198
◆二 取消壮文教学的民族中学校长		205
◆三 新任民族中学校长		221
后记		230

第一章

民族中学印象

从1993年到1998年,我在乐业县民族中学居住了将近六年时间。乐业县民族中学被认为是乐业县城最差的中学。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可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总之对其中原因没有作过多的思考。2001年到2003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壮族儿童社会化研究——广西乐业县实地调查》,由于课题研究的需要,我对这所中学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调查,对她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是从这时起心里产生了一个疑惑:乐业县民族中学真的那么差吗?为了把这一问题弄清楚,2004年5月,我又一次踏上返乡的路程。

一 民族中学与普通中学的共性

中国人知道广西,一是因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二是因为广西是中国唯一一个壮族自治区。乐业在广西,早几年大多是不为人所知的,甚至连乐业县所属的百色市,也必须是对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历史有相当了解的人才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是西部省份。如果将我国与美国进行一番比较,倒有些风味,美国的发展也是搞了一个西部大开发,我们是搞梯度发展,先发展东部沿海省份,然后进行西部大开发。当然了,美国至今东部仍然比西部发达,我国也不例外。如果说广西是一块红土地,那么百色就是红土地当中的红土地了。但是,这块被赋予红土地称号的地方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因为这里是山高水长、崎岖偏远之处,历史上的贫穷再加上交通等方面的艰难发展,也就造成了乐业县的现代贫穷。在这样的环境下办教育,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广西,像乐业县这样的地方常常被人们称为“三不管”地带,事实上乐业县只能算得上“两不管”,因为从乐业县往北跨过南盘江就是贵

州省了,其余三面都还在广西境内,但这是云贵高原的边缘。引用社会学中的边缘人概念,从自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乐业县都具有“边缘”的鲜明特征,这在后面乐业县举办的公共教育阐述中都会得到体现。

虽然距离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有四百多公里的公路路程,可是近几年,乐业却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主要原因是人们发现乐业县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天坑溶洞群,引起了国内外地质界、旅游界的关注,国内外的很多探险家都来到这里的天坑、地下暗河进行了多次探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和《探索·发现》栏目还多次对此进行过报道。随着人们慢慢地到乐业来考察、探险、旅游,乐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也渐渐为外界所认识,还有乐业县的风土人情也让很多外人感兴趣。君不见,乐业县现在的风情游也为外人所津津乐道呢!

外面的人对乐业感兴趣,是因为乐业的景观和乐业的人。乐业山险、洞幽、水清,特别是乐业的水,在山岭岩洞中穿梭,幽灵般时隐时现,构成一道道绚丽的风景画。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土与人情总是连在一起的,历史上乐业的风情、人民反抗、群众运动以及土匪活动均小有名气。

乐业县民族中学就这样坐落于乐业县的奇山绿水中,沐浴着故土的浓浓风情。关于乐业县,县政府在 2002 年 12 月 18 日所作的文稿《乐业县基本现状及教育简况》这样写道:“乐业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毗邻广西天峨县、凤山县和贵州省的册亨、望谟、罗甸县。这里气候宜人,素有‘天然空调’之美称,全县年平均气温在 16 摄氏度左右。全县辖三镇七乡,86 个村委会、1 084 个村民小组,总面积 2 617 平方公里,总人口 15.1 万人,居住着壮、汉、瑶等 11 个民族,其中农业人口 13.4 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52.8%。”这不但写出了整个县的概况,也说明了建立民族中学的一个原因——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

大家都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唯一一个靠海的西部省份,但乐业县却“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自然也就靠不着海了。在我国,凡是离海近的地方,大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广东、青岛、大连等,因此大家习惯将这类地区称为“沿海地区”,它们甚至有时就是财富的一个代名词。乐业县与海无缘,“位于广西西北部”,当然也就与财富擦肩而过了。2001 年,乐业县人均 GDP 仅有 1 620 元人民币,而在

1978年,则仅为202元人民币。^①在我国,老天爷往往喜欢与人开玩笑,风景越是秀丽的地方,常常也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乐业县民族中学所处的乐业县,同样也遵循着这样的规律。作为一所民族中学,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办学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困难,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乐业人习惯将乐业县民族中学简称为“民中”。民中位于县城所在地同乐镇。由于是一个县首脑机关所在地,同乐镇自然也是乐业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在同乐镇,像全国各地一样,一个县级机构的五脏六腑,部局委办,六大班子,一应俱全。同乐镇也聚集着全县的主要学校——乐业县中学(完中,也称为一中)、乐业县高级中学(简称职中)、乐业县第二中学(简称二中),还有乐业县第一、第二小学,这些都是全县学龄儿童精英集中地,而乐业县民族中学则被人们称为“三中”,甚至有人将其称为“同乐镇中”或“镇中”,因为尽管是全县首脑所在地,但奇怪的是同乐镇至今没有自己的一所中学。这也是同乐镇人民看到其他乡镇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学后一直愤愤不平至今的原因。当然了,恼火归恼火,日子一样得过,因为恼火也恼火不出一所中学来。

从县城中心去民中,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正规”的路,那是建校之初就由政府规划而买下来的,一般情况下人们不走这条路,因为不仅路程要长得多,并且路面当初是怎样,现在还是怎样,坑坑洼洼的。原来这条民中路比较宽敞,两边很少有居民的房屋,后来很多人在路的两边建房子,这些房屋就像不断繁殖的蚕一样,肆意地吞食着民中路这张绿叶,以前很开阔的路面现在仅能容一辆小汽车挤过去,也没有路灯。民中的每一届领导都为这事去奋斗过,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民中历届领导为民中路奋斗但都无功而返,这除了与自身努力不足、相关领导处理不力外,还与乐业县有形无形的民间势力有关,这恰是中国当今转型期社会的又一特点,只是在乐业显得更为突出罢了。至今乐业县历史的痕迹仍然十分清晰,乡间宗族、亲戚、村寨的势力对正统的政治都产生或明或暗的影响,哪怕是掌握了国家强制力的机关

^① 陆启光:《壮族儿童社会化研究——广西乐业县实地调查》,华东师范大学2003届博士学位论文。

对于那些“可管可不管”的事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中路的解决除非是民中将相关侵害人告上法庭,否则想在已成事实之前通过调解和阻止那是相当困难的。

从县城到民中的另一条路是小路。小路往往都是捷径,这条小路也不例外,它至多有民中路的一半行程,不是开机动车的话,大家都走这条路,虽然路陡坡急,偶尔也会有人摔跤,而那些大意的家伙有时则会掉到路坎下的泥田,但好走、路程短、有路灯这些都符合大家的需要。于是,民中的大门虽然是设在民中路的那一头,但门卫室却设在小路这一边。沿着陡峭、光滑而又弯弯曲曲的小路盘旋而上,有一道仅容得下两人并排走的小门,这就是大家常走的民中“大门”。由于门的一侧常有人倒垃圾,因此这一侧有一条用红油漆写的警示语:“严禁在此倒垃圾。”门的另一侧则是一条可能是红底黄字的横幅标语:“热烈欢迎市‘普九’评估验收团到我校检查指导!”从开始变成粉红色的纸上可推测出前不久百色市刚刚组团到这里进行“普九”工作检查,在校园的其他地方也看到两条这样相关的标语:“向市评估验收团的领导、专家学习、致敬!”“热烈欢迎市‘普九’评估验收团莅临我校评估!”按照国家关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有关政策,经济发达地区应在199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济欠发达地区则要求在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余经济很不发达地区的目标是在21世纪初逐步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乐业县是广西的28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应该归入第三个行列。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的规划,乐业县是广西的四类(最差)地区,目标是“1998年前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到2000年,这类地区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60%左右,2010年基本实现‘普九’任务”^①。

乐业县的“普九”工作如此艰巨,与她的教育发展情况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乐业县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小学教育方面,1980年,全县总人口为104 090人,包括各教学点在内全县共有学校385所,在校生12 122人,教师总数为892人(包括公办和民办)。^② 1982年,全县共有

^① 百色地区教育局编:《教育政策法规学习手册》,1999年7月。

^② 乐业县教育局:《乐业县教育志》,1990年,第82页。